



INGNIAN:

自我超越的思考

ZIWO
CHAOYUE
DE
SIKAO

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青年：自我超越的思考

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曹均伟
特约编辑 董小苹
封面设计 邹越非

青年：自我超越的思考

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625印张 169000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3,001—28,000

ISBN 7-80515-048-6/D·5

书号：3299·046 定价：1.50元

目 录

第一编 社会变革与当代新青年

- (1) 新时期青年思潮纵览 段 跃
- (22) 1976—1986: 上海青年的成长轨迹 刘正民
- (29) “老三届”: 经历特殊的一代 ... 崔武年 阎 淮
时代边际性: 对当代大学生的理性思
考 陈尔平
- (35) 考 陈尔平
- (47) 论女青年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适应 潘 一
尧茂书——当代青年追求之缩影
- (56) 朱钦芦 罗安明
- (64) 从“荷锄躬耕”到亦工亦农 王静萌
- 71) 商品经济下的青年社会问题 龚海峰

第二编 跨世纪观念的建设

- 现代化·新国民精神和传统思想工作
- (75) 的结构性改造 陈启豪
- (90) 社会发展与青年观念的变革 苏颂兴
爱国主义教育的反思与一代新型国民
- (99) 的塑造 秦沪虞

- (111) 理想教育中需澄清的两个问题 俞健萌
- (118) 商品经济发展之于民主建设的意义 张建农
- 试论青年的自由选择与社会期望的矛盾
- (123) 及其调节 方 坚 韩 敏
- 大学生的社会化与心理指导
- (130) 仲玉英 曹渊勇 金 伟
- (138) 青年性观念的变化及其对策思考 薛敦方
- (144) 试论大学生“人的问题” 童忠益

第三编 时代选择与青年工作

论青年思想工作的科学化社会化系统

- (152) 化 黄跃金
- (159) 略论共青团工作的改革 吴汉民
- 聚集当代青年精英，增强团的吸引力
- (168) 和凝聚力 毛国云
- (176) 基层团组织行政化工作方法批判 王俊杰
- 试论高校学生情感转折期及人生观教育
- (183) 育 毛 恩
- (191) 论青年活动的实验性原理 施 凯
- (199) 青少年保护法的诞生及特点 柴俊勇
- 浅论共青团开展“东西互助”的独特作用
- (205) 用 陆 新

第四编 创设中的青年学

发展中的青年观及其历史导向

(211)	 吴 端 陈小亚
(225)	青年学的对象是青年的本质 陆象淦 —— F·马赫列尔青年学理论概述
(235)	青年意识的发生过程 谷迎春 杨张乔
(240)	关于我国青年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金国华
(244)	城市青年文化的特点 荣牧民
(253)	校园文化及其建设价值刍议 田 锋
(262)	青年学的发生及其发展概述 田志华
(271)	后 记

第一编 社会变革与当代新青年

青年的性格是时代的性格。

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今天的青年一代那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革。

迅疾变化的时代塑造着一代青年，而青年又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在这相互作用的情形下，青年一代的经历、职业乃至性别的差异，往往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正是带着这种不同的文化烙印，当代青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目眩的变幻和丰采呈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前——

新时期青年思潮纵览

段 跃

1978年到1985年间，青年的思潮以其多元性、多层次性的特征，一破以往倾向单一集中的格局。青年思维的触角逐渐伸向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从对建国以来社会生

活历程的怀疑性思考，转移到对探求民族现代化道路的追寻性思考。形成思潮的阶段频繁更迭，并且同一思潮又表现出多种思考角度，多个认识层次间交叉渗透的复杂现象。

1978—1981：怀疑性思考阶段

1978年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经济上的调整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促使青年对“文革”乃至十七年以来的全部政治历程进行反省和批判，形成以怀疑为基点的怀疑性思考阶段。怀疑性思考使一代青年在挣脱极左政治束缚的同时，增强了自我意识，开始了对民族现代化的追求。对社会政治的怀疑以及对传统人生观的怀疑是这一阶段思潮的两大潮头。

怀疑性思考阶段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就社会经济对青年思想的影响而言，1978年至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恢复和调整时期。劳动就业问题十分突出。青年的就业、升学、工资、住房等实际生活处于困难的境遇。这些现实使青年人感到不安和迷惘。就青年自身的生活经历而言，这一时期的青年大部分出生于五十年代中、后期，其接受文化教育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的，动乱的社会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文化空白和精神创伤。这种创伤造成的恶果，一方面使他们迫切希望用自身的力量改变现实，另一方面又由于自身力量的严重不足，使实现愿望的可能受到阻遏。于是相当一部分青年陷入了青春被误的沉痛追悔中。就社会思潮对青年思

潮的影响而言，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社会思潮越来越集中于通过对政治文化的反拨、政治经济的思考和政治历史的反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省和批判，全民族弥漫着痛定思痛的感伤情绪，这种情绪无疑也影响着青年。这些事实，引发出青年用理性的眼光重新看待民族那段历史的强烈愿望；而对以往27年全部社会历程的怀疑和批判，无疑又首先成为青年思考的主要问题。

这一时期青年的思考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进——从社会政治的思考到人生观的思考。

（一）对社会政治的怀疑和批判

“政治生活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最为重要的部分，极左政治的影响也首先表现在政治对人们生活无所不及的恶性控制。”（引自《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作者季红真，载于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三期第13页）一代青年心灵的创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恶性控制的恶果。因此怀疑性思考首先自然地表现为对社会政治的怀疑和批判。这一点通过三个层次的思考表现出来。

1. 在“自我”悲剧的层次上，自发地对制造悲剧的社会政治进行谴责。

1978年，青年中出现了三个热潮：声讨“四人帮”罪行的热潮；参加高等院校考试的热潮和阅读“伤痕文学”作品的热潮。三个热潮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青年对文革以来自身经历的思考。他们从封建蒙昧主义和极左政治对广大青年灵魂的扭曲中清楚地看到：自己的

思想、性格已被“四人帮”的专制束缚得近于僵化；自己接受文化教育的大好时光已被“造反有理”、“接受再教育”、“反师道尊严”等政治运动无情地剥夺了；甚至连一个人最基本的父子之情、男女之爱也在政治的利害中被扼制了……。这一切无不使他们痛苦地意识到：几年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政治上的牺牲品。于是在青年的认识中，政治被视为自身受害、受欺骗的根源。“四人帮”时期的极左政治无疑成为青年人指责的主要对象，此时期青年对社会政治的谴责基本局限于自我的层次，既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对制造自身悲剧的社会政治进行谴责。

2. 在社会悲剧的层次上，对社会政治进行否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大量在极“左”路线下的冤假错案纷纷披露。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各种新的思想、理论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思想和生活方式如潮水般涌进来，青年视野开阔了，面对世界发达水平的国家，他们的心理受到强烈的震动。广大青年意识到，极左政治，不但危害了个人，而且使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遭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于是个人的悲剧感扩展为社会的悲剧感。作为悲剧根源的极左政治的内涵已从“四人帮”的专制扩展到十年动乱，乃至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的全部政治历程。

3. 在探讨如何铲除产生“四人帮”土壤的层次上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全面否定。

几乎与第二个层次的思考同时，1978年11月至1979年3月，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形成了北京“西单民主墙”，同时

出现自发性刊物。关于这一现象的政治作用及别有用心者的企图不是本文所论及的。需要分析的是“民主墙”和自发行物向我们展现了两个客观存在：第一，其参与者以青年为多数；第二，青年们提出的问题集中地反映了其对文化大革命和建国以来民族历史的思考。而思考问题的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极左政治的谴责和否定，而试图铲除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增强人民的民主意识。青年们在研究中广泛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关于国家机器、国家权利和国家制度等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概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时期民主与法制理论；以及封建主义传统对我国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这一部分青年对社会政治的思考已经从讨伐“四人帮”罪行的表层深入到探讨为什么产生“四人帮”的里层；前两个层次被视为原因的极左政治在这里成为了结果，尽管青年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偏激的，但这种由表及里的思考却包含着对文革以来社会政治问题更为深入的反思。

对极左政治的怀疑和批判，表现了青年一代敢于从蒙昧和动乱中走出来，正视民族灾难的勇气，标志着一代青年已开始对民族现代化的热烈追求。

然而，由于历史和青年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实际生活中大量尖锐、复杂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是难于在一朝一夕内得到解决的，这给相当多青年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产生所谓的信任危机提供了可

能，并造成一部分青年由此走向对政治厌恶、恐惧，对社会前途丧失信心的极端。青年思想上那种旧有的对政治无限虔诚的平衡状态在危机中打破了。

与此同时，广大青年要求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达到新的平衡的愿望也与日俱增，许多青年开始意识到，一味停留于对社会政治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而把一切积怨全部渲泄于社会更是无济于事，因此，在产生“三信危机”后，相当一部分青年又一次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自我。对自我的反省和认识通过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油然而升。

(二)对旧有的人生意义进行怀疑和批判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以“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题的人生观大讨论。讨论持续了8个月之久，引起各行各业成千上万青年的强烈反响。讨论中青年们围绕着人的本性、人的价值和“公”与“私”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与粉碎“四人帮”前青年普遍信奉的人生信念相悖的疑问。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不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吗？”“人的本质难道不是自私的吗？”“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不就成为必然了吗？”“难道个人只能服从社会，而社会却不应该尊重个人吗？”等。

上述问题深刻地告诉我们：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标志着中国社会正逐渐进入一个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充分调动每个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积极性为目的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意味着当

社会开始为个人而存在的时候，个人也就开始成为社会存在的积极因素了。青年们提出的问题恰恰反映了这一新的历史要求。因此，青年对人生意义的思考首当其冲地表现为，对旧有人生意义中个人价值的思考，而思想的落点又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对粉碎“四人帮”前广为人们所信奉的，在集体主义原则下确定人生目的和人生道路的人生观提出的置疑。

然而，青年们所怀疑的集体主义原则，并非“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的共产主义原则。而是怀疑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由一度比较纯正的集体主义原则所退化成的以个人迷信、人身依附、严重压抑个性发展为特征的封建性原则：集体的中心不是平等的个人，而是神。领袖从人被抬高到神，人民却从人降低为神的工具，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在集体主义原则的幌子下遭到严重的窒息。整个民族开始了人在神面前自轻自贱，互轻互贱的历史。当代青年，尤其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亲眼目睹和亲身体会到的，恰恰是那以历史被扭曲了的集体主义原则为特征的人生观。用青年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目睹了人的基本权力丧失殆尽，人的尊严受到粗暴的践踏；目睹了在疯狂煽动下的自相残杀；目睹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告密、提防和自保而极度恶化……”于是，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中集体主义原则就伴随着对集体主义原则的歪曲的否定被否定了。

这种否定，对于深受其影响的青年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1979年至1981年间，青年中三种现象引人注目。

目：第一，信教的青年急剧增多；第二，自杀的青年急剧增多；第三，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据全国几个重要省份和大中城市的统计，上述三种现象无论从数量、还是数量的增长幅度看，都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罕见的。从当时的分析资料中可以看到，轻生、厌世、对社会、集体的不信任感以及理想的破灭感是致使青年走向信教、自杀、偷渡之路的直接诱导因素。尽管这些现象仍然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情绪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青年通过积极的学习、实践和探索，努力寻找更为科学的人生真谛；另一部分青年则简单地把现实中某一类现象罗列起来，做直观外推类比，引出合理利己主义的结论；还有一部分青年看破红尘，否定一切，走向清静无为、消极避世的人生道路。同时，当代青年与其前辈之间的代沟问题，以及对西方人生哲学盲目追随的思潮也由此日益显现出来。

在这充满苦闷与追求、徬徨与抉择的痛苦振动中，当代青年一方面终于唾弃了现代迷信和它所衍生的最大的“公”就是“忠”的人生教导，开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另一方面他们又陷入到人生的信念由破碎到重建的过渡时期新的不平衡中。迷茫中他们朦胧地感到：作为中国的青年仅仅要求社会对个人负责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懂得个人在社会的舞台上应处于何等位置，扮演何样角色，做出何等贡献。1980年前后青年们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我设计，立志成材”

等口号，正是他们在痛苦中发出的呐喊。于是，对民族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青年应该重建怎样的人生信念的探讨，就伴随着对旧有人生意义的怀疑和批判开始了。

青年们对文革乃至前17年的反思，虽然以一部分青年走向消沉为代价，但又以一代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为补偿。在怀疑、批判的过程中，寻求新的社会、人生理想的渴求逐渐压倒了痛定思痛的感伤情绪。由此，一个新的思考阶段孕育成熟。

1981—1985：追寻性思考阶段

改革的步伐振动着社会固有的生活秩序，引动了青年追求民族现代化的强烈热情。1981年后，青年的思潮出现了大的转移，进入到以追寻为基点的思考阶段。追寻性思考增强了青年认识的主体能动作用，引发出青年意识的分化，对社会政治和人生观的思考仍然是此阶段思潮的两大潮头，与此前不同的是，两大潮头间不是阶段性的演进，而是齐头并进的发展。

1981年3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庆祝中国女子排球队夺取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中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引起全国亿万青年的强烈反响。此后，青年的思潮显现出一个大的转移，即从怀疑性思考到追寻性思考。

这个转移并不是随意的。第一，社会生活的显著变化为此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客观条件。1981年后，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针，率先在农村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城市经济改革也处在出台前的紧锣密鼓之中，随着对外开放步

伐的加快，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文化以高出以往任何时代的
速度、数量不断地涌入。这一切为我们民族古老的机体注
入了新的活力，使青年认识活动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四个明
显的变化：其一，社会生产的初步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初步
改善，使正在迷惘中的青年看到了新的希望；其二，三中
全会后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确立，使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呈
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为青年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提供了更
为广阔的舞台；青年认识活动的领域也由此而扩展了；其
三，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大大开阔了青年的视野，丰富
了青年的思想，增强了其建设现代化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其四，随着我国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青年
们所接触的知识量和信息量都远远超出了其父辈。青年在
这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清楚地意识到，历史已不
允许他们继续沉浸于怀疑和否定的痛苦中了。

第二，这一转移是在社会条件和青年自身认识发展的
矛盾运动过程的相互作用下完成的。当社会生活的变化刚
刚显现出来的时候，青年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仍沿着怀疑性
的轨迹做惯性运动，但从表面上看他们追寻民族现代化道
路的意向已日益明确地显示出来。因为，引起社会变化最
重要的因素是改革，而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恰恰是对传统
经济、政治、文化面貌的否定，这是与怀疑性思考时期青
年的不满情绪相吻合的，所以即使在对改革缺乏感性经验
和理性思考的情况下，青年也会由于其具有否定性而趋于
追随，使青年认识转变过程中呈现出非同步状态：在青年
认识的表层，追寻的意识占主导，而认识的深层则怀疑的

意识占主导。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在追随改革的实践活动中，那种青年人固有的渴望奋斗、创造，不断追求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了，而对以往历史的谴责、怨恨和对未来的惶惑、迷惘逐渐地融化在重新点燃的热情中，对民族现代化的追求，从认识的表层延伸到深层，成为这时期青年思潮的主流。

第三，青年群体内部的相互影响对这一转移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经过怀疑性思考后，青年与其父母身上社会文化烙印的差别日益引人注目，彼此间的隔阂与不理解也因此而加深。而青年内部彼此间的交流则增强了，相互间的影响也大大地加深了。因此，青年群体内部的相互影响也就成为这一转移不容忽视的因素了。进入八十年代后，由于社会的变革和由此引出的文化变迁，使在不同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身上显现出不同的文化烙印，加剧了其群体内部的分化，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那些在痛苦中探索、拚搏的追求者和看破红尘的消沉、堕落者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越来越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命运，而前者对于广大青年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无疑会远远超过后者，使广大青年从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青年身上进一步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追求和奋斗的力量。

以追寻为导向的思考基点的转换标志着一代青年对社会、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认识阶段。怀疑的因素并没有消逝，而是融合在对民族现代化的热烈追求中。尽管由于历史与青年认识能力的局限，这种追求一时仍难于从盲目寻找的层次中超越出来，然而青年一代选择的积极意向已日